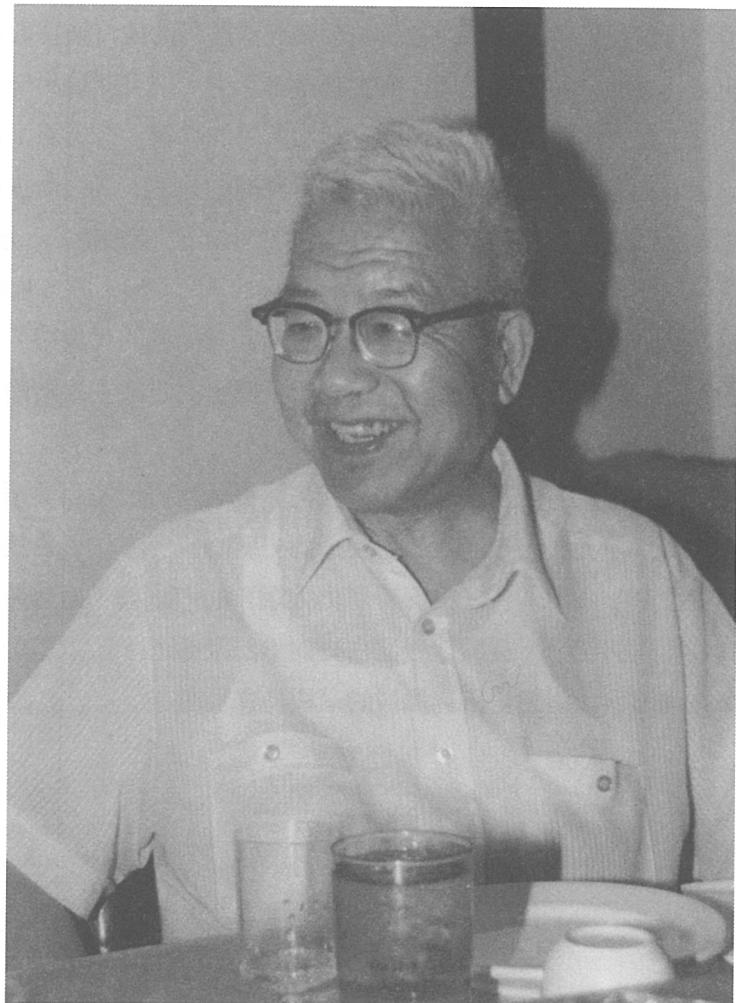


# 中國古代史研究 ——臺灣觀點

哈佛大學第一屆「楊聯陞講座」講詞

史學研究同仁題之  
每因往事推來事  
不薄今人愛古人  
楊聯陞一九八六年



楊聯陞(1914-1990)談話的神采（七十歲生日）及遺墨

杜正勝  
(中央研究院院士)

## 一、

學術要有傳承，也要有知音。我從未夢想過有機會來聞名於世的哈佛大學發表演講，尤其像今天這個場合，「楊聯陞紀念講座」的首次演講。楊教授是本世紀下半世界少數著名漢學家之一，執教於哈佛大學數十年，作育天下英才無數，譬如擔任我的介紹人的余英時院士就是他的得意門生。論學問，論輩分，以及論我對楊教授的了解，我都沒有資格來主持今天的講座。不過，我還是非常感謝哈佛大學東亞系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能夠公開地表達我對楊教授的感激與懷念。

我在一九八〇年進入史語所，楊教授是史語所的通訊研究員，與史語所關係密切，但直到一九八三年，我被選為哈佛燕京社訪問學人，來哈佛研究才有機會向他請益。這一年我雖然沒有撰寫論文，但不論學問的領域、思考的角度或研究的方法，都有長足的進步。我要特別感謝的人中，楊教授就是一位。我首先將已經發表的論文，如〈封建與宗法〉，或尚未發表的文稿，如《編戶齊民》的一些篇章送請他指正，他都像老師批改學生的學期作業一般，細細看，寫下他的評論還給我。後來他定期約我見面。我永遠不會忘記十五、六年前的情景，在神學路二號東亞系那棟典雅建築的二樓、一間寬敞的研究室內，每週一中午，一老一少對坐，一邊吃三明治，一邊談論學術的、文化的，以及中國或台灣的問題。三明治是楊夫人做的，肉、菜俱全，非常豐富，還有甜點和水果，我只負責泡茶。

我在哈佛的那年，據說是楊先生晚年健康情況最好的一年，週一中午的會談，據我記憶所及幾乎很少中斷。我們談論的話題寬廣而龐雜，我不記得有什麼話題成為以後我論文的題目，但自八〇年代中期開始，我的學問方向有所轉變，我想這一年無目的的談論肯定是不可或缺的發酵劑。

一九八四年三月楊聯陞、丁邦新、與杜正勝  
在哈佛燕京社合影



\* 講座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在哈佛大學Boylston Hall舉行。茲徵得主辦單位哈佛大學東亞系同意，中文稿先在臺灣發表，特此致謝。

## 二、

現在應該回到今天講座的主題，說明什麼是台灣觀點的中國古史研究。我的專業領域偏於中國古代，上面提到的兩種著作是我在這個領域內三本代表著作的一部分，這三本書即是《周代城邦》（1979）、《編戶齊民》（1990）和《古代社會與國家》（1992），寫作時間大概從1973到1986年。《周代城邦》和《編戶齊民》一開始便以專書的規模論述，觀點鮮明，提出「城邦論」和「編戶齊民論」，呈現我對古代中國政治社會發展的整體看法，與中國或日本的學者頗不相同。至於《古代社會與國家》的篇章原是獨立發表的論文，後來重新安排，刪汰重覆，遂略具專書的規模。不過，這書並沒有提出其他新的史學觀點，可以說是對上述兩種理論的補充。1992年我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有新聞記者標識我的史學是「非馬列主義的人民史學」（《自立晚報》1992.7.15），後來也有記者介紹，說我的研究呈現「台灣觀點」（《中國時報》1993.2.19）。

歷史研究隨著不同史家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而有不同的重點，史學著作也因而呈現不同的風格。這是歷史家自主性的一面，但相對地歷史家也會受到外在條件的制約，譬如他的學習傳統（或可稱做學派）和他所生存的時空環境。這幾種因素一般多是湊雜一起的，不過，在特定情況下，可能某一因素會占居優勢。我們不妨從這個角度來討論「台灣觀點」的形成。

台灣和美國類似，進入文明不到四百年，按照順序，荷蘭統治38年，明鄭22年，清朝212年，日本50年，最後國民政府至今55年。台灣有現代化的學術始於日本統治時期，但人文學的研究，尤其和今天講題有關的中國歷史研究，日本人在台灣並沒有留下什麼傳統。以我比較熟悉的歷史學來說，他們沒有培植出著名的日本史、東洋史



杜正勝中國古代史研究的代表作



傅斯年畫像（李石樵一九五二年作；現藏臺灣大學）

(中國史)或西洋史學家。所以現在論台灣的史學研究，尤其是中國史，只能從1949年以後觀察；換句話說，台灣的史學傳統是來自中國大陸的歷史家奠基的（參杜正勝，〈台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第二次大戰結束不久，國民黨與共產黨爆發第二度內戰，有些傑出史學家紛紛遷徙來台，主要集中在兩個機構，一是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是台灣大學歷史系。這批學者包含中國學術現代化過程中的第一和第二代，其中不少人還是推動此一運動的關鍵人物，譬如胡適、傅斯年、沈剛伯、李濟和李宗侗等人。台灣的史學研究雖然比中國

史學現代化推遲三、四十年，但論世代則大抵相當。所以在台灣建立的史學研究，毋寧說是中國現代化史學的移植或延續，按照當時逃避共黨統治來台的人士的心情，是要延續其史學傳統，以免遭受紅色污染和迫害，這和政治人物跑到台灣來延續政統有些類似。因此，日本不會建立的史學空白立刻由中國現代化史學填補，做過五十年殖民地的台灣，遂未發生類似其他後殖民地區所從事的歷史重新解釋和學術自主運動。

從五〇年代起，台灣的學術環境相對於中國大陸是自由得多的。在台灣，即使實施戒嚴法，一個學者只要不挑戰現行政策，未對國民黨或蔣氏政權構成威脅，仍有相當大的空間從事學術研究；尤其像上古史這種遠離現實的領域，除共產黨納入人類長程歷史的理論外，很少有人會把它與意識型態掛鉤。上述「避秦」到台灣的歷史家便在「安全範圍」內，比中國大陸的學者不受干擾地維持學術的獨立和自主。雖然安全的界線因人、因時、因課題而有所伸縮，但過去幾十年台灣的史學研究大體上多在這樣的規範內進行，直到九〇年代才完全解除政治禁忌，不過，史學社群間則萌生統獨意識型態之爭，那是另一問題，離今天的講題稍遠，可以不論。

### 三、

上面提過，來台歷史家主要聚集在史語所和台大歷史系，前者以傅斯年、李濟為首，後者如沈剛伯、李宗侗和姚從吾等人。傅斯年雖出任台大校長，但不及兩年就去世，他的史學思想在台灣大學並沒有充足的發展，不過在他一手創造經營的史語所則被奉為圭臬，傳承成風。台大的史學主要受沈剛伯的影響，他比傅斯年早到台灣，促成傅斯年出任台大校長，擔任歷史系教授和文學院院長超過二十年。關於傅、沈二人史學思想的差異，我已有專文發表（〈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茲不詳論，不過他們都能排除政治壓力的扭曲，盡量追求客觀的史實——這樣的觀點和態度，即使傅相當樂觀，而沈比較悲觀，但基本上還是一致的。這構成台灣史學研究的基本風格，我們要分析中國古代研究當然也不例外。

傅先生的研究主要是中國古代民族史，沈先生長期講授希臘羅馬史，晚年轉而研究中國古代思想文化史；他們兩人的專業領域都屬於古代中國，而研究方法則以古籍新解見長。論台灣的中國古代研究，第一代學者中當然不能忽略李濟和李宗侗。李濟利用科學考古的材料重建中國古史，我在一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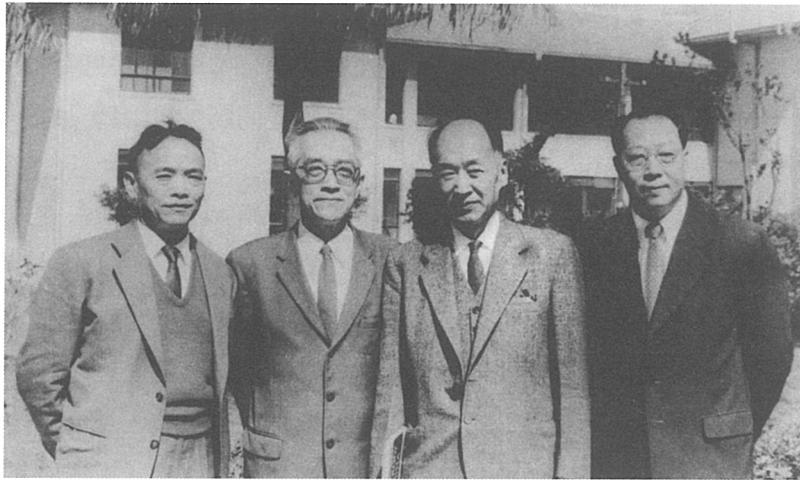


一九七三年沈剛伯榮退演講的神采

論文中闡述他從考古走入歷史的典範性貢獻（〈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在考古學的基礎上建立中國古代史，成為台灣歷史學家研究古史的基本原則。大家熟悉的張光直和許倬雲，都是李濟的門生，傳承這種學風，影響到我這一輩以及比我更年輕的學者。

李濟長期擔任史語所所長和台大考古人類學系主任，他的中國古代史學不只是史語所的方法學，也是台大的方法學。不過，台大還有另一種古史研究，那就是李宗侗的古代史學。李宗侗的學術角色與研究方法我也有所論述（參〈中國社會史研究的探索〉），可以稱作人類學的古史研究，藉用民族誌和比較古史，揭露古代社會組織的特性。

傅、沈、二李是台灣的中國古史研究的第一代學者，也奠定這個領域的基本風格。第一，他們堅持學術獨立自主，不受政治干擾，更不作興去呼應意識型態。其次，根據可信的資料做合理的解



梁序穆、胡適、李濟、與李先聞在南港中央研究院合影

釋，以重建中國古代社會的面貌。第三，整合多種學科，除傳統文獻之詮釋外，最重視考古資料，旁及民族學、古文字學和古器物學。我生也晚，傅先生未及見，上大學時李宗侗先生已不教授中國古代史，我只上過沈剛伯和李濟兩位先生的課，並且有幸受沈先生以及傅先生的學生高去尋教授聯合指導碩士論文。

另外，在我唸大學的時代，台灣史學界極具影響力的人物是當時的青年學者許倬雲教授，他的專業也是中國古代，而把美國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介紹到台灣，應用在史學上。許先生的博士論文 *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 (《先秦社會史論》) 以統計分析論證春秋到戰國的社會流動，即是一個範例。我是許先生的學生，受他多方面的影響，但我對當時流行的社會科學方法並不熟練，也沒有太大的興趣，所以我的古史著作很少有這方面的痕跡。

#### 四、

1966年我進入台灣大學歷史系，這年中國發生驚天動地的「文化大革命」，1971年上研究所，翌年動筆寫碩士論文。上面說過，日本五十年的殖民統治，歷史學沒有留下什麼學術基礎。1950年代的台灣，史學方面，圖書奇缺，外面的訊息也非常隔膜。五〇年代中期前後，中國的古史學者展開古代社會性質的辯論，討論奴隸制和封建制該在古代那裡分段，也有人提倡第三種社會形態，即亞細亞生產方式。諸如此類的馬克思主義術語，在當時台灣的言論尺度，已超出所謂的「安全範圍」之外，學者為全身而計，不宜宣之於口，著之於文；何況這是「共匪」討論的問題，除非少數

「匪情專家」有點專利，一般人是不敢碰的。所以「古代社會性質」這個課題在台灣的史學研究和教學根本不存在。即使同時期日本學者熱烈研討的中國古代專制主義、古代國家性格、人身支配，或土地所有制等問題，也因為具有「左」的色彩，不能公開討論。

但在中央研究院，這個不論實際生活或精神領域皆與台灣現實社會有相當距離的學園內，卻可以閱讀到這些禁書，好像享有治外法權的租界似的，算是一個安全地帶。我在史語所的傅斯年圖書館讀到上述討論古代社會性質的專書和論文，嚮往大歷史解釋，但對於中國學者的爭辯，只在馬克思主義的歷史階段論中翻滾，甚不滿意。我一邊看爭辯，一邊檢查他們的根據，於是回溯古典，進入古代世界，逐漸發現中國歷史的特質——可能在馬克思主義的架構之外。我的《周代城邦》就是這樣形成的，提出城邦的理論，希望超越亞細亞生產方式、奴隸制以及封建制的糾纏。

《周代城邦》原為碩士學位論文，題目是〈城邦國家時代的社會基礎〉，初稿寫於1973年，主要關懷的對象是與政治相對的社會。1950年以後的台灣，政治上一黨、一人專制，但社會上，「順民」還可享有一些自由，而「動口不動手」的自由主義份子也還被容許有一點存在的空間。影響所及，青年人也會關注政治與社會交錯的種種問題。雖然現實生活中政治壓力甚為沈重，卻還有一絲自由空氣，遂使一個歷史學生反省中國歷史上何以政治力愈來愈大，社會力愈來愈小。這方面的思考，我相信也受到許倬雲先生研究西漢政權與社會勢力交互作用的啟發（《求古編》，頁453-482），但我把這個問題往前推，發現中國曾有過社會力量幾乎可與政治力量平起平坐的時代，那就是西周和春秋。這種與秦漢帝國以下截然不同的歷史走向，我歸結是「城邦」的國家型態造成的。我當時的研究，在學術論文之外，有一項附帶的收成，即是從先秦典籍發現可以滿足二十世紀中國自由主義者的一些需求。春秋的社會曾有一種稱作「國人」的自由民，不但有生活的自由，也有積極參政的權力。於是心嚮往之，分別從國人、野人和貴族建構我的周代城邦的世界。

中國有人比我還先使用「城邦」或類似的名詞，侯外廬稱作「城市國家」，日知（林志純）稱作「城邦」。但侯氏的「城市國家」是亞細亞生產方式的另一種提法，他把這個階段放在奴隸制形成的前期（《中國古代社會史論》，頁151-161）。日知把中國古代城邦視同希臘城邦（《古代城邦史研究》），按照他們奉為經典的馬克思理論，其實就是奴隸制。我的城邦意涵與他們都不相同，我認為不但住在城裡的「國人」是自由民，即使住在城外的「野人」也不能認為就是奴隸。總而言之，我的城邦論是馬克思階段論以外的東西，不能在階段論中尋找位置。

《周代城邦》涉及的問題，在七〇年代初期的台灣，多少是帶有一點風險的。由於國民黨自陶希聖退出政壇後，已沒有理論家，他們對我的論述不會產生興趣。雖然我反駁中國歷史家對古代社會的解釋，但與台灣的政治立場卻一點也沒有關係。我還是秉持五〇年代以來的學風，追求真實的歷史。我初發心，固起於現實關懷——尋找與政治力抗衡的社會力，但學術訓練提醒我不能以自己的偏愛左右客觀的事實，至今我仍然未發現以前使用的證據或推論有牽強附會的地方。雖然在八〇年代以前，我的城邦說是對專制獨裁的不滿，而九〇年代以來，城邦說也許可做為抗拒蠻橫統一論的歷史依據，但這些都無損於中國古代城邦的事實。這也是在許多年輕人不敢相信有所謂「真實」的思潮中，我仍然堅持求真是歷史家重要使命的緣故。

## 五、

那個時代，即使像侯外廬或日知的城邦論，在中國都屬於少數派，不過由於考古學多元論的發展，以及古代城址的陸續發現，城邦說現在已獲得肯定，考古家蘇秉琦所提出、而為學術界普遍接受的「古城、古國、古文明」說就是最好的證明。對於城邦內部的社會結構與城邦間的對待關係，八〇年代我繼續有所論述，並且結合文獻、古文字和考古資料，把城邦說上推到國家形成的時期，建構城邦——城邦聯盟——封建城邦的三階段發展順序，總稱作「城邦時代」。城邦時代大約起於西元前2500年或更早，延續兩千年之久，到春秋戰國之際才結束。它和秦漢帝國以下兩千年的帝制剛好分別占居中國文明史的兩大段落，可以籠統稱作「古典」和「傳統」兩大階段。這是我研究古代史而對中國通史的一種宏觀劃分法，旨在說明秦漢以後政治社會有其一貫的共通性，當然不是說過去兩千年中國社會停滯不變。我的第二本著作《編戶齊民》就闡述這個觀點，故以「傳統政治社會結構之形成」做為副題。

《編戶齊民》的寫作開始在1980年，其心境與《周代城邦》相似，都想從歷史尋找中國何以政治力量獨大的原因。1980年的台灣統治威權依然肅殺森嚴，自由主義者的苦悶仍然不得解脫。但像我這輩人早年的關懷，進入九〇年代以後，恐怕已喪失現實的意義，先前反專制、反獨裁的熱情對九〇年代成長的台灣青年來說可能有點滑稽。短短十年間，台灣政治社會變化之巨且烈，使年紀還不算太大的我感覺恍如隔世！其實一個民族，如果自由、人權要靠無數人拋頭顱、灑熱血才能換來，那是這個民族的恥辱，不值得驕傲。我寧願我的子女告別中國的「編戶齊民」傳統，視自由、人權為他們的天賦權利，也不希望我的《編戶齊民》還有現實性。

從《周代城邦》到《編戶齊民》，即從春秋到戰國的轉變，中國傳統史學的術語是封建到郡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家謂之奴隸制到封建制，日本東洋史家稱作中國古代帝國的形成。我從城邦論的脈絡發展下來，專門分析西元前600-200年中國社會發生的變化，就國家型態而言，城邦崩潰，經過短暫的「領土國家」（借用宮崎市定術語），進入帝國；就政權結構而言，封建貴族的分封、分權轉為皇帝所代表的中央政府的集權；就基層社會之組成而言，城邦時代國人與野人的身分區別泯除，變成平等的「齊民」，但原來國人的政治力量也隨之徹底消失。這種新體制就是帝國，以皇帝為首的中央政府集權，消除城邦時代的任何政治勢力，包括貴族和自由民。於是中央政府透過各級地方政府掌握全國人力，雖說「天高皇帝遠」，皇帝真要找你，任你飛上天也跑不掉。全國人民都註冊登記，向政府提供兵丁，服務徭役，繳納租稅，但政府並不必對他們有所回報。齊民就是順民，談不上參政，談不上人權，甚至不可能要求尊嚴，他們是帝國政府的最穩固的基石，這就是中國兩千年帝制最基本的社會性質。也許吧，有這樣的齊民，才會出那樣的專制皇帝，反之亦然。編戶齊民的社會和專制獨裁的政治總是分不開的。

作為一個歷史家，因感於自己也是編戶齊民的一份子，對他們是同情悲憫遠勝於責備的。我毋寧想替歷史上的芸芸衆生吶喊幾聲，喊出他們的不平，抒發他們的憤慨，但我並沒有使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大概是因為這樣，有人才說我的研究是「非馬列主義的人民史學」。《編戶齊民》牽涉的層面甚廣，包括兵制、戶籍、地方行政、土地所有權、村社構成、法制和身分等，每一部分都有相當精微的論證，不只限於一般歷史，凡秦漢以下兩千年之軍事、政治、經濟、法制等方面，本書都鉤畫了原型，直指傳統兩千年中國統治的本質。

齊民的「齊」，是指法律身分的平等，實際的社會並不如此，而是隨經濟力的大小呈現不平等的身分。當寫作《編戶齊民》時，我已準備另作附篇，題為《羨不足論》，討論戰國到西漢社會上財富分配不均的情形。至今只發表兩篇關於戰國商人的文字，因為這些年來我思考的重點有所轉移，又負擔公共職務，時間、精力都分散了，以前所寫《羨不足論》的初稿一直擱在抽屜裡，沒能整理問世。

學術界提出類似於「編戶齊民」之理論的學者，早於我的有日本的木村正雄（《中國古代帝國の形成》），和我同時的則是南韓的李成珪（《中國古代帝國成立史研究》）。我們使用的名詞接近，但意涵並不相同。木村正雄的「齊民制」係以國家占有、支配治水灌溉機構作基礎，根據他的看法，城邦時代也屬於齊民制，而且齊民類似於奴隸，這與我的齊民論相去甚遠。至於李成珪的「齊民支配體制」，齊民只是秦

國介於有爵者和謫民（或奴婢）之間的自由民，人數不多，與我認為齊民是兩千年帝國基礎的廣大群衆當然也是南轅北轍的（參杜正勝，〈編戶齊民論的剖析〉）。在我看來，編戶齊民做為中國政治社會結構的基礎，長達兩千年，因為有這樣的社會基礎，才養成專制獨裁和不尊重人權的體制。我相信台灣應該可以逐漸脫離編戶齊民的社會，也許會走向所謂的「公民社會」，但還不敢貿然斷言，因為台灣的政治社會發生大轉變不過十年而已，在歷史洪流中只如一瞬；根據我的研究，兩千多年前，編戶齊民的形成大約經歷四百年呢！

## 六、

上面說過，我進入史學研究的園地時，走的路子並不是當時台灣風行的社會科學方法，而是中國或日本學者所關注的政治、社會性質問題，基本上近於馬克思主義的取向。我雖然努力建構自己的體系，與馬克思主義史學家截然異趣，但八〇年代中期以後，我也警覺到尚未跳出馬克思的陰影，於是思考如何走出陰影。此一學思過程無法備述，簡單說，我想在舊有研究的基礎上增加一些新成分，以達成一種新的整合。譬如人體的骨骼和血肉，二者缺一，皆不足以為人。我以前的研究近似骨架，往後應該發展血肉，甚至心靈的部分，合併起來才是完整的歷史。

在台灣，這樣的思考對歷史研究是一種廣泛而且根本的改造運動，1990年我和一些朋友共同創辦一種新學刊，叫作《新史學》，企圖開闢史學的新天地。我相繼作了幾篇關於方法學的文字（如〈什麼是新社會史〉），也有幾篇專題論文，探討中國本土的文化特質，包括肉體、精氣和魂魄的人觀（〈形體、精氣與魂魄〉），操之在我的生命觀的形成（〈從眉壽到長生〉），以及居室所反映的倫理觀和宇宙觀（〈內外與八方〉）等等。這些課題包括後世中國社會普遍存在的醫療、長生和風水等文化現象，也像「編戶齊民」一樣，是一種文化原型的探研。兩、三年前我也把八〇年代後期開始思考的物怪寫了一篇未完成的初稿〈古代物怪的研究〉，附標題是「一種心態史和文化史的探索」。這裡揭舉的心態史和文化史，可以做為我所謂血肉心靈的具體方向，有的朋友說這是一種人類學的古史研究，我治學亦私淑於李宗侗先生，要這麼概括，也可以接受。遺憾的是這些年來我的外務相當龐雜，古史血肉的新方向的成品還不多，不如前一階段所論的社會骨架，著作集中，論點鮮明，而前後二種研究的結合也還在摸索中，但以上幾篇論述多少可視為古代史學的新猷。

## 七、

中國古代史學自二十世紀初顧頡剛揭舉疑古大旗，掃蕩傳統古史觀，至今將近八十年。八十年來中國古史研究突飛猛進，比中國史的其他部門熱鬧轟動，論成果之豐碩，觀念之翻新，可能無出其右者；而與現實思潮之關連，除近現代史研究外恐怕也要數古史最密切了。但晚到九〇年代接近中期時，中國居於領導地位的學者卻提議「走出疑古時代」（李學勤，《走出疑古時代》），一時影響，舉國從風，似乎變成研究中國古史的新方針。

過去幾十年的中國古代史學是不是仍然沈迷在疑古風氣中，以至最近還要勞動學術權威來呼籲？這是可以考察的事實。大家知道疑古大師顧頡剛很早對他原來的方法就提出修正，而他的同學傅斯年早在1928年創立史語所之前，已走出疑古，標舉重建了。傳統古史觀的虛幻樓閣被顧頡剛摧毀後，傅斯年想在這片廢墟上用盡一切可信、可用的資料，慢慢建造另一棟堅實的建築——中國古代史來（杜正勝，〈從疑古到重建〉）。這些可信、可用的資料主要是考古出土的新資料，過去幾十年考古學所重建的古代史就是這種史學思想的體現。

顧頡剛疑古的貢獻，倒不止摧毀長期以來存在於中國人心的意識型態而已，他毋寧更關注那些神話傳說所制作或流行的時代的心態，譬如戰國時代流行的堯舜或更早的神話傳說，多少虛幻，多少真實，並不那麼重要，對顧頡剛來說，反映流傳的時代更甚於傳說的本身。換句話說，他寧用堯舜禹傳說研究戰國秦漢，而不是研究堯舜禹的歷史。這點胡適（《古史辨》，第一冊，頁192）和余英時（《史學與傳統》，頁272-279）兩位先生已經先後從不同的角度指出其方法學的意義，在今天看來，顧頡剛倒有點「後現代」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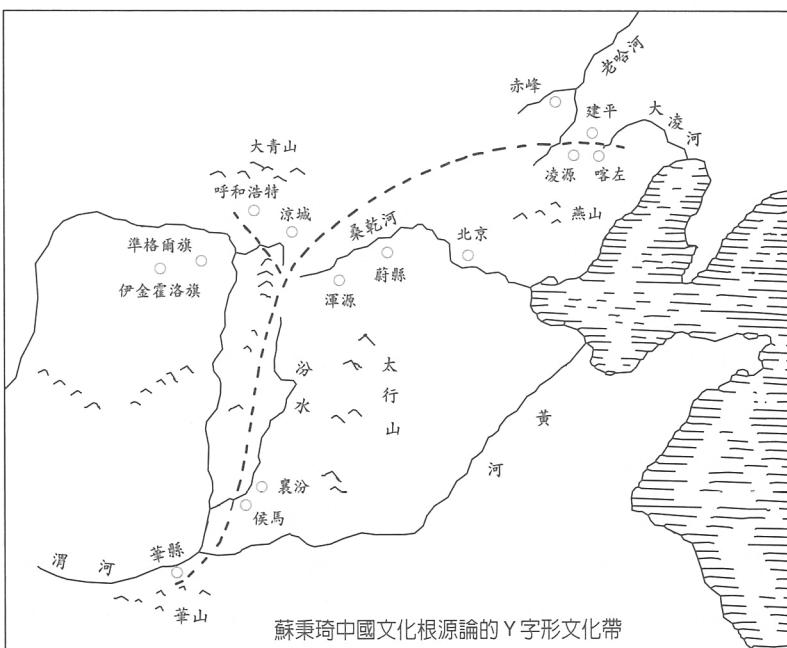
偽書可能有真材料，晚作的書也可能包含早期的材料，這是古史學者的常識，不必深論。利用典籍個別的記錄，證成古史，也經常在個別的專題研究中出現，並且取得良好的成績。幾十年來中國古代史學的進展基本上早已超越單純的懷疑態度，然而並不表示傳統古籍的記載基本可信。七〇年代以來陸續出土大量而且種類繁多的古籍，基本上都屬於戰國中晚期到西漢初期。過去極端懷疑者往往矯枉過正，把先秦典籍下拉到魏晉，這些新發現對他們的確產生矯正的作用；但如果以為這樣就可以「信古」了，恐怕也不適當。這些論述的「古史」，與作者所在的戰國秦漢時代至少相去兩千多年，能算是直接史料嗎？所以黃帝、炎帝仍得請他們留在傳說的領域內比較保

險，而《史記》五帝傳承系譜的構成還是用傅斯年「全神堂」的眼光來看（〈夷夏東西說〉，《傅斯年全集》，三，頁147），才比較契合考古學已經建立、而且現在普遍為人接受的中國古代文化多元論。除非我們能發現四千年或五千年前的典籍，否則西元前三、四世紀出土的文書，即使述古，仍無法說服顧頡剛「層累說」和傅斯年「合譜論」的質疑。

## 八、

傅斯年古代史學的大方向是重建，他的工作伙伴李濟一生努力的目標也是重建中國上古史。重建派最倚賴的新資料來自田野發掘，而把田野資料密切結合並提出細密方法的是蘇秉琦。蘇氏約在1980年發表區系類型理論，至今將近二十年，據他的入室弟子張忠培說，到下一世紀（初？），中國考古學的方法論還是區系類型，還不會有新理論產生。蘇秉琦用區系類型衝破中國考古、歷史學界長年以來的兩大束縛，即根深柢固的中華大一統觀念，和把馬克思社會發展規律當作歷史本身，毅然對中國學界長期存在的中原中心、漢族中心和王朝中心等傳統觀念提出挑戰（《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頁2、32），在中國人文社會學界，老而彌銳、這麼有活力的人並不多見。

蘇秉琦最後一段歲月，把他的史學思想與考古學方法作一總結，去世不久出版的《中國文明起源新探》可以算是他的晚年定論。這本書包含許多有趣味而且富於啟發性的課題，我現在只想討論他所謂中華文化根源地的問題。按他的說



法，是在燕山南北長城內外的北方，而不是一向所認為的三河地區。這麼說，的確超越中原中心和漢族中心的束縛，但在台灣的我又如何來理解呢？

八〇年代蘇秉琦寫過一首打油詩，點明上述的意思，詩云：

華山玫瑰燕山龍，  
大青山下斝與甕。  
汾河灣旁磬和鼓，  
夏商周及晉文公。

考古學家研究陶鬲，開風氣之先，最具體系，而且做為檢證文化的基本因素者，當推蘇秉琦。根據他的晚年定論，鬲這種三袋足器可能是關中仰韶文化尖底瓶和河套土著文化蛋形甕結合的結果，其前身是斝（《中國文明起源探》，頁41），這就是打油詩「大青山下斝與甕」的由來。他早年研究廟底溝文化，就提出華夏民族之名出自此系文化的陶器花文。燕山龍指遼西紅山文化的玉龍，汾河灣旁指陶寺遺址。一言以蔽之，蘇秉琦認為中華文化的本源（或者借用他的話說是「直根系」）在一條Y字形文化帶上，從渭河通過汾水北上，到山西北部長城地帶一路西走內蒙河曲，一路東到遼西，自新石器時代早期、晚期，經三代到春秋戰國一脈相承。這條文化帶在過去認為是南方農耕民族和草原游牧民族拉鋸衝突的交界線，華夏與戎狄區隔和混雜的地帶，而今蘇先生把它當做中華文化的本源，確是新見解。

這個新見解和過去的認識距離很大，據我判斷可能與蘇秉琦對現在所謂「中華」民族的認定有關，似亦有所為而發。1994年在太原召開「晉文化會議」，蘇先生親自對我說，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皇帝是康熙，因為有康熙才有今天中國的版圖。但包含蒙古、西藏、新疆（東土耳其斯坦）的中國版圖在過去兩千年是不會有過的，兩千年前更未之聞。換句話說，如果新石器時代考古學證明中華文化的根源是在歷史時期的北疆，那麼商周以下三千年的北方民族與華夏是不是同源呢？那麼兩三千年來東西草原帶間來來往往的民族該怎麼解釋呢？中國本部的文化到秦漢雖形成高度的統一性，原先卻是多元的，我們當然不能再抱持中原中心論，但可用這條Y字形地帶取代中原嗎？蘇先生的新見解也許可以使現代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中國找到歷史的「根據」，但無法解釋兩千年來中國北疆的歷史事實。

張光直說得不錯（〈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1950年以前中國考古學最主要的特徵是民族主義，1950年以後則與中國政治局勢一同演變。然而事實上五〇年以後底層的伏流還是民族主義，所以馬列教條稍鬆，民族主義很快又冒出來。李學勤的走出疑古時代，舉世矚目的夏商周斷代工程，以及蘇秉琦的Y字形文化帶，不都顯現民族主義的痕跡嗎？

傅斯年和李濟誠然也是民族主義者，但他們對外來的文化因素是敢於承認的，這從李濟及第二代考古家高去尋的思考角度和關懷可以獲得充分的證實（杜正勝，〈新史學與中國考古學的發展〉、〈通才考古家高去尋〉）。台灣的中國古史學對這個敏感又熱烈的問題，反映大概是比較冷靜的，一方面與嚴謹學風有關，一方面與政治現實也有關。我曾根據動物文飾研究古代北方民族與文化（〈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最近也解釋商王朝以外的三星堆文明（《人間神國》），我不認為交錯帶的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根源，而只當作現今中國境內的文化因素而已。不論蘇秉琦的本意如何，他雖然反對漢族中心，然而由於現在「中華」文化的範疇涵括甚廣，他的理論顯然可以被賦予現實的政治意義，但一還原到歷史時期，我們卻不能不承認燕山之北、大青山下應該都是相對於華夏（或漢族）的異民族和異文化。承認異民族、異文化的存在，進而研究他們怎樣與漢民族、漢文化對峙或交融，恐怕比硬把他們講成中華文化的一員還更合乎史實，更平等合理地對待吧。

## 九、

1949年的遽變，到台灣來的歷史家頗多以古史聞名，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尤其具有輝煌的傳統。然而五十年來，形勢推移，台灣的中國古代史學只是千山競秀中的一峰，無法再有1950年以前獨占鰲頭的優勢。這個領域，台灣固有先天的不足，但也有比較有利的條件，如學術傳統與政治社會環境。我今天的演講只是二十年來研究中國古史的一點心得，因為個人才性、學術傳承以及與時空環境互動的關係，形成了一些看法，有與中國或其他國家學者不同的地方，不妨籠統稱作「台灣觀點」。

台灣觀點有可能是一種反省的觀點，跳脫既定的思考模式，重新檢討中國古代文明。中國兩三千年的青銅時代中，武器和禮器特別發達，《左傳》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戰爭和統治是中國國家和文明的主要本質，所以遠古萬邦併為千、百國，最後成為一個帝國。然而相對於青銅文明比中國可能還早的班清(Ban Chiang)文化，青銅絕少用做武器，而是裝飾品，即使不如中國輝煌，但對現代人類的啓示恐怕亦有深義。亦如台灣古代史，晚到十六、七世紀，還是原始社會，固然沒有傲人的成就以與中國相比，但那個社會的平等性、個人的獨立性以及女性的地位，對下個世紀的人類社會並不一定比中國的偉大文明遜色。

我曾經被教育成中國人，也以中國文化人自居，但現在面對的是蠻橫威脅台灣，無所不用其極的中國政權。中國人信奉的孔子雖然說過「修文德以來遠人」，但現在

的中國對台灣則完全背道而馳。做為一個專業中國史家，心情的複雜是難以言喻的，不免讓我再問什麼是中國，什麼才是中國文化真正的本質？我的專業訓練規範我要客觀面對史料，不要被主觀的感情左右。當我少了一些中國人的民族情懷，也許多一些公正的視野，相信這對中國文化的理解，以及中國人的未來是有幫助的。

## 引用書目

- 日 知 1989 《古代城邦史研究》，人民出版社。
- 余英時 1982 《史學與傳統》，台北，時報出版公司。
- 李學勤 1997 《走出疑古時代》，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
- 杜正勝 1979 《周代城邦》，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1990 《編戶齊民》，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1992 《古代社會與國家》，台北，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 1993 〈歐亞草原動物文飾與中國古代北方民族之考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64本2分。
- 1994 〈編戶齊民論的剖析〉，《清華學報》新24卷2期。
- 1995 〈台灣中國史研究的未來〉，收入《古典與現實之間》，台北，三民書局。
- 1995 〈從疑古到重建——傅斯年的史學革命及其與胡適、顧頡剛的關係〉，《中國文化》12。
- 1998 〈番社采風圖題解——以臺灣歷史初期平埔族之社會文化為中心〉，《景印解說番社采風圖》，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98 〈史語所的益友沈剛伯〉，收入《新學術之路》，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1999 《人間神國——三星堆古蜀文明巡禮》，台北，太平洋文化基金會。
- 侯外盧 1955 《中國古代社會史論》，人民出版社。
- 胡 適 1924 〈古史討論的讀後感〉，《古史辨》第一冊中編。
- 張光直 1998 〈二十世紀後半的中國考古學〉，《古今論衡》1。
- 許倬雲 1982 《求古編》，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傅斯年 1933 〈夷夏東西說〉，收入《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出版公司。
- 蘇秉琦 1997 《中國文明起源新探》，香港，商務印書館。